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 闻一多—— 闪耀世界诗坛的一颗星

魏文文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1999年12月20日，《七子之歌·澳门》作为澳门回归庆典活动的主题曲传遍大江南北，走向世界，并逐渐成为澳门的一个文化符号。2019年5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朋友们回信，信中提到：“我经常想起《七子之歌》，歌中表达的游子对回到母亲怀抱的渴望十分感人。”这首歌的歌词正出自诗人闻一多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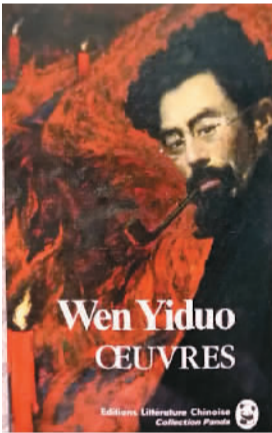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1925年留学美国时创作的组诗，包括“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和“旅顺、大连”7篇。诗人以第一人称口吻反复吟咏“母亲！我要回来，母亲！”，作品以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感情，表达了闻一多乃至海外留学生的心灵寄托和精神归属，跨越近百年，其爱国情怀闪耀至今。《七子之歌》只是闻一多的代表作之一，他的不少诗作在中文读者心中都具有恒久的魅力，这与他既深谙中国诗学传统，又从西方现代诗歌潮流中得到启迪息息相关。

## 融汇中西诗学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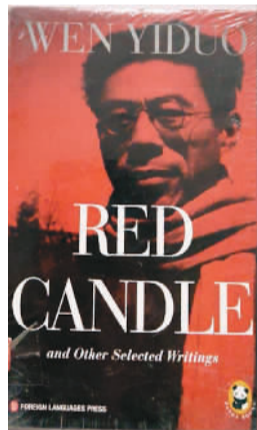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新诗运动出现“中国热”潮流。闻一多正是这一潮流的助推者，回国后，他还把意象派的影响扩大至中国诗坛，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闻一多于1922年7月赴美留学，初到美国所选的专业是美术，但是他怀揣的一颗诗心逐渐被芝加哥哥重重的诗歌氛围感染，诗歌逐渐占据了她的精神空间。闻一多开始频繁与美国意象派诗人交往，他在书信中曾记录下自己1922年出席卡尔·桑德堡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演讲会以及和浦西夫人、哈丽特·蒙罗、尤尼斯·娣简丝、罗厄尔等著名诗人交往的情况。他以极大的热情搜集、阅读、欣赏和研究意象派诗歌，还曾在书信中抄录和评价罗厄尔的《风与银》、蒙罗的《爱之歌》《山之歌》等诗歌。

此外，美国诗坛上兴起的“中国热”潮流以关注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王维等为中心，庞德、韦雷、卢威尔等诗人曾用自由体翻译李白的诗。尤其是庞德由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改写的《谪客来信》，成为风靡英美诗坛的重要作品。闻一多对此异常关注，并对美国诗坛的“中国热”潮流的中诗英译作品进行客观的学术评价，称“韦雷注重的是诗里的音



▼闻一多《红烛》英译本



▲《闻一多诗文集》法文版

乐”“在字句的结构和音节的调度上最讲究”，“卢威尔注重的便是诗里的绘画”“字句的色彩当然最先引起她的注意”。

置身于美国意象派诗歌的氛围中，闻一多努力坚守的诗学理论逐渐成熟，诗歌创作也迎来新高峰。在弗莱契的影响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秋林》，并注明是“一篇色彩底研究”，包括《红烛》集62首诗中大多数篇目都用了相当多色彩强烈的词汇。后期意象派领袖罗厄尔十分喜爱中国古典诗歌，善于在诗歌创作中运用中国习语和中国式比喻，曾被闻一多称为“在此邦是首屈一指”，她对闻一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闻一多虽深受美国意象派影响，但并未直接套用意象派的创作技巧，而是巧妙结合了中国新诗的特点。他强调用理性节制情感，呼吁诗人们不要刻意追求诗歌形式，相反要使情感的表达与形式完美结合，寻求精妙的艺术构思，将内心的情感体验传递出来；同时在新诗语言的革新、现代格律诗写作、中西诗意的融合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和实践，对纠正早期白话新诗平白直叙的倾向、促进中国新诗艺术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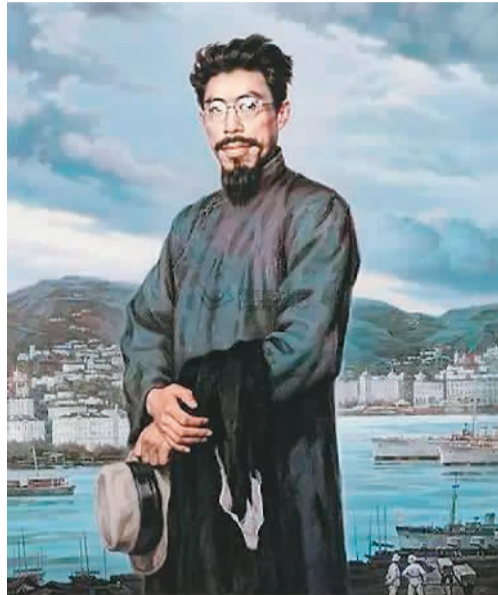
## 海外译介量多质优

闻一多诗歌的世界影响离不开中外学界对闻一多诗歌的海外译介、研究与推广。闻一多诗歌的海外译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明显优势，既有诗歌合集，又有个人诗集。1936年由陈世骧和阿克顿合译的第一部中国现代诗歌合集《现代中国诗选》收录了闻一多、陈梦家、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1947年，罗伯特·白英编选的《当代中国诗选》出版，共收录“五四”到1947年的9位诗人的诗歌作品，闻一多作为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被收录。白英认为，闻一多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传统，与艾青、田间共同构成中国现代诗歌的主线，充分肯定了中国新诗的“新传统”。1960年，罗伯特·培恩编的《白马集》在纽约出版，收录闻一多等中国现代诗人的300多首新诗，附录部分收入了闻一多论田间诗歌的评论文章《时代的鼓手》，闻一多的评论也开始走向世界。1963年，华裔美国学者许芥芬编选的《20世纪中国诗歌选集》，按新诗发展中产生的流派分类总结新诗成就，收录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作品。

在法语世界，1957年，法文版《中国诗选》出版，编选中国古今诗歌，现代部分仅收录艾青、闻一多、郭沫若、徐志摩的诗歌。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出版的中国诗歌合集逐渐丰富，闻一多成为编选过程中格外受关注的诗人。如1984年路易·艾黎编的《大道上的光与影：现代中国诗选》、1992年奚密编的《中国现代诗歌选集》、1995年刘绍铭、葛浩文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2007年邱平等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选1919-2000》等，都收录了他的诗歌。

闻一多个人诗集英译本出版的数量在中国现代诗人中仅次于艾青，主要有1972年伦敦出版，桑德斯翻译的《红烛：闻一多诗选》；1987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戴乃选翻译的《闻一多诗选》（于1999年再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向海外展示中国作家个体的艺术特色与成就，中国文学出版社的“熊猫”丛书自1981年推出单个作家专集，所选的大多数是中国



图片来自网络

现代短篇小说，现代诗歌部分仅翻译了艾青的《黑鳗》和闻一多的《闻一多散文诗选》。

## 海外研究深入多元

闻一多诗歌在海外的频繁译介丰富了闻一多的海外研究，他是为数不多被海外专家深入研究的中国现代诗人之一。闻一多研究很早就走向世界，并且在日本、德国、韩国、美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受到研究者青睐。

俄罗斯闻一多研究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1968年，学者苏霍鲁科夫出版了《闻一多生平与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1995年成立了闻一多研究会，这是海外最早成立的闻一多研究学术团体，2000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闻一多学会。2002年12月，由日本闻一多学会主办的《神话与诗》创刊，日本学界逐渐开拓闻一多研究的新领域，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角度发掘闻一多思想、艺术价值。以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何致翰为代表的德国闻一多研究也十分活跃。何致翰先后出版了两部闻一多研究专著，主编过《闻一多研究论文集》。2000年5月，在图宾根大学举办的“诗人、学者、爱国者——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20余位各国专家围绕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等论题展开研讨，受到德国《施瓦本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盛赞，扩大了闻一多在德国的影响。美国闻一多研究同样不可小觑，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闻一多研究小组，以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何致翰为代表的德国闻一多研究也十分活跃。2005年，闻一多孙女闻丹芝在美国创办闻一多中英文网站，介绍闻一多的作品、艺术成就、闻一多研究等，弘扬闻一多的爱国精神。

汉学家马悦然曾表示，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已达到“世界文学顶尖水准”，“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出的作家”。闻一多的艺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在海外广泛深入传播并持续产生影响，是中国现代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骄傲。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博士后）



《扶贫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演绎了一种复调，亦即本书的第三重复调。

除了叙事结构的特色，《扶贫志》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真实性——它的惊心动魄、步步惊心的真实性。由高密度的感人细节波连波、浪打浪奔涌成的扶贫人的感人事迹，让我几次动容，不得不在压住哽咽和泪奔中阅读。比如老兵王新法建烈士陵园的决绝，比如好几位原本家境富裕的村干部，因帮助村民脱贫，却顾不上自己的情状。也有的故事，带给我的是沉重与喜悦相伴的感动，比如大字不识几个、卖了一头猪就敢拍电视剧《千里寻母记》的传奇人物田金珍。在表现这些时，作者“我”用冷静、不动声色的零度叙述呈现，但却丝毫掩饰不住被采访的主人公现身说法的感染力，他们坦荡的、原汁原味的讲述，充斥着情感的温度。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作者对复杂语境处理的高妙，筋筋绊绊，一枝一叶，说服力很强。

写湖南，又不囿于湖南；写扶贫期间，也写扶贫之前和扶贫后的未来——这填充和撑开了《扶贫志》的格局与志向。书中和盘托出的诸多案例、样本，其稀有性与丰饶性，实验性与先锋性，典型性与囊括性，尤其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实效，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役，提供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可以想见，没有一片赤子情怀，没有对土地的信仰，没有敢于吃苦的作风，卢一萍的采访就不可能这么深入，更写不出风暴中的那几多微澜、微澜中的那几多澎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来，多家出版社推出文学类主题出版物。

作家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系统梳理百年中国文学成就，精选《新俄国游记》《白毛女》《谁是最可爱的人》等60部兼具时代性、文学性与现场感的红色文学经典，对稀缺初版本进行抢救性重现，以初版本影印的方式出版，具有珍贵的文献、史料及版本价值。另一部丛书《百部优秀剧作典藏》共10卷，550万字，系统回顾了戏剧文学发展历史，遴选出话剧《屈原》、歌剧《洪湖赤卫队》、京剧《骆驼祥子》等100部戏剧经典，既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戏剧文化实践的珍贵记录，也展现了百年中国戏剧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2021年主题出版物推介会”，推出多部新书。“建党百年百篇文学短经典”系列，精选反映建党百年光辉历程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与散文纪实作品100篇，按发表时间分为《开天辟地新航程》《崛起东方新中国》《劈波斩浪新征程》《走进辉煌新时代》四卷，其中既有经过时间考验、读者广为传颂的红色经典，也有以饱满热情书写改革开放、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新篇。纪实作品《1937，延安对话》是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在中国的首次出版。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毕森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用文字和镜头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作家铁流的报告文学《靠山》记述了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动人场面，通过上百个真实故事浓墨重彩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互为“靠山”的血肉联系。

广西师大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长篇纪实散文《后龙村扶贫记》，聚焦曾经极度贫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凌云县泗城镇后龙村，作者罗南在书中展现了贫困群众与扶贫干部之间由陌生、防备、对峙到接受、融合、改变的过程。后龙村背陡坡陡独具特色的日常生活让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地域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刘玉的《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从民间记忆角度出发，将散落桂北大地、湘江两岸中央红军长征所到之处留下的珍贵故事打捞起来，再现了48位口述人经历的湘江战役。

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新书《新北京新京味儿——百年百篇话北京》，精选百位当代散文名家作品，以北京地域为表达范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时间轴，以“百年变迁收笔底，京味京韵写正道”为特色，用优美的文字、灵动的意象、大写的精神，记录了北京城的人文历史，见证了北京城新旧时代的更迭和新时代北京人的精气神。

上海文艺出版社向读者重点推荐该社庆祝建党百年书单，其中包括何建明《革命者》《浦东史诗》、李约热《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李明春《山盟》、哲贵《金乡》、郭菲《寻找支格阿尔》等纪实文学和小说以及《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碧血丹心家国魂——革命烈士遗文大典》《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等12种作品。

## 《虎贲》：再现少共国际师战火青春

本报电（辛丽芳）7月11日，当代作家温燕霞红色题材长篇小说《虎贲》首发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举行。

《虎贲》是一部正面讲述少共国际师青少年红军战士不惧艰难困苦、浴血奋战、勇敢成长的小说。上篇通过以杜鸿运为主人公的一群青少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在残酷的战争中成长为合格军人，并最终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感人事迹，再现了少共国际师的英雄传奇；下篇以杜鸿运的曾孙、某电视台时空对话节目编导杜思代的视角，讲述后人对先烈的苦苦追寻，反映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据了解，作为漓江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联合打造的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虎贲》已入选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建党100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中国好书”2021年6月榜。

## 《流俗地》：

### 细致描摹马来小城市井生活

本报电（张子航）近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长篇小说《流俗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马来西亚锡都都被居民喊作“楼上楼”的小社会拉开序幕，用细腻的笔法讲述了当地居民的市井生活。

主人公银霞生来是盲女，聪慧、敏感，善于洞察人心。她既愿意在家编织箩筐，也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她学象棋、上盲校，在随生而来的困顿里劈开了一片天。小说以跳接时空的叙事手法，为各个角色穿针引线，每个短篇看似独立却又连续，写出了小城市人在生命狂流里的载浮载沉。

马来西亚华语写作向来负荷民族与国家、母国与母语、他乡与故乡等重大命题，“可是，到了‘流俗地’却降为人世间”，作家王安忆评价说。作者黎紫书说，书中“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和光怪陆离的社会背景，但我希望它打动中文世界”。

# 多种主题出版庆祝建党百年

本报记者 张鹏禹

## ◎新作评介

# 一棵梨树标定的纸上风暴

——读卢一萍长篇非虚构《扶贫志》

## 凸凹

近两三年以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不少，或写国家层面，或瞄准一省、一市、一县甚至一村；或全景式表达，或侧重基础设施建设、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医卫配套、产业发展、先进事迹等某一方面。作家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形成一场令人瞩目的纸上风暴。而引发这场风暴的原点，就是“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见证这场风暴的，除了2013年11月3日这一时间点，还有梨子寨靠近山顶处一棵古老的梨树。

这棵梨树，在文学乃至美学意义上，成为了精准扶贫的一个地标。卢一萍的四十万言《扶贫志》就是由这棵梨树开篇的。从这棵梨树出发，他以花垣县为原点，以湘西为腹地，以湖南为案例，向世界讲述了中国脱贫攻坚获得巨大成功、诞生人间奇迹的原因。

《扶贫志》由五篇十八章和前引、结语构成，且缀有后记。第一篇“首倡地”写花垣县委书记罗明和十八洞村驻村帮扶队长龙秀林，对风暴发初地的帮扶探索、举措与行动。第二篇“大地基石”写田金珍、龙献文兄妹，谭绍祥、谭泽勇、田昌英等几位本土乡村干部舍己为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第三篇“且将他乡当故土”写邱孝、刘斌、杨凯、时鹏等几名异乡人，从省城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到湘西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和帮扶队员的所作所为。第四篇“在悬崖上逆袭”写了酒鬼龙先兰、病残吴添春和留守女谭艳林三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年轻一代村民，与命运顽强抗争，反过来帮助其他村民脱贫致富的人生之变与奋斗奇迹。第五篇“仰望星空的人”写几位有想法、有情怀，已然从农民变成城里人的理想主义者，毅然转身贫瘠边远农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立志振兴乡村的故事。他们中有“90后”“50后”，有大学生，也有失

学者，他们是麻兴刚父子、石泽林、王少甫、张顺心和牺牲在扶贫岗位上的老兵王新法。

由此看出，卢一萍的笔墨完全用在了人的身上，基本上是每一章主写一个人，写出了一组置身精准扶贫战中各色人等的生动群像。人脱贫了，也就意味着产业的兴起，意味着有衣食住行、有宜居环境，也就意味着村子脱贫、农村脱贫了。所以，扶贫即扶人，而扶人，必先扶志。所以，书名中的志，既指志书的志，又指志气的志。

写人更应该写人的内心。可内心又被对方衣饰和肉体的城堡紧紧包裹，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写？这个难不倒卢一萍。为避开误写、谬断的尴尬与风险，他将这一作业交给了采访对象，由他们自己一字一句、落子有声地讲述出来，而卢一萍所做的，是把它们忠实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和时间去检验。

这样一来，《扶贫志》就具有了复调式叙述结构。书中每一章，基本上都是由两个人的讲叙交替相嵌叠加而成。一个人是作者自己，讲地缘与历史、背景与环境、由来与过程、效果与影响，穿针引线，承上启下，担当总编导的角色。另一人（其中两章为两人）即采访对象，讲人生经历、苦难与绝望、失败与成功、矛盾冲突，尤其讲心路变迁和思想心得。还有一种复调，是全书五篇由本土人与异乡人、扶贫人与被扶贫人、官方人士与民间人士等不同身份者穿插回环形成的复调。

没有写作的田野考察、现场感与亲历性，何来非虚构？偏偏是，卢一萍反其道而行之，让读者从引言、五篇十八章，直至看毕结语，竟没能看见一个“我”字！他的策略是，把大量的“我”，藏在了后记中。如是，后记就成了正文的一部分，或者说与正文